

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

第 二 辑

1985—1999

辽 海 出 版 社

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

第二辑

(1985—1999)

辽海出版社

1999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 第2辑/辽宁省博物馆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9.6
ISBN 7-80649-044-2

I. 辽… II. 辽… III. 博物馆学-文集 IV. G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2226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 1200 千字 印张: 46 1/4	
印数: 1—1,000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郭守信 路永久	责任校对: 姚义田 郭鸣一
封面设计: 路永久	版式设计: 张秀俊

定价: 64.00 元

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 (第二辑)

目 录

一、文物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

说“阳安”布	徐秉琨 (1)
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	徐秉琨 (6)
先商文化探源	蔺新建 (10)
两汉夫余研究	蔺新建 (18)
顺山屯类型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	蔺新建 (27)
下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谱系研究	李晓钟、蔺新建 (36)
试论曲刃青铜短剑的渊源	朱 贵 (46)
大连地区青铜时代先民饮食之考古学考察	刘 宁 (52)
考古学所见两汉之际辽西郡县的废迁和边塞的内徙	王绵厚 (59)
古代高句丽族称探源	王绵厚 (66)
关于汉以前东北“貊”族考古学文化的考察	
——兼论大石棚和石棺墓文化的族属与时代	王绵厚 (69)
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考古学文化	王绵厚 (79)
高句丽古城的构筑特点及其特殊规律	王绵厚 (89)
关于朝阳袁台子晋墓壁画的初步研究	刘中澄 (102)
唐左才墓志析	王金炉 (108)
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考释	阎万章 (113)
关于契丹大字墓志纪年的考释问题	阎万章 (117)
北票出土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铭》考释	阎万章 (132)
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考释	阎万章 (144)
龙岗辽代墓志考释	姜念思、韩宝兴 (151)
辽宁辽代砖塔的砖雕艺术	包恩梨 (156)
试论辽宁出土的唐三彩器与辽三彩器及相关问题	李红军 (163)
辽瓷的造型、装饰艺术及其美学特征	李红军 (173)
“骨朵”试析	梁淑琴 (179)
略论唐代皇家马球场——从明皇击球图谈起	梁淑琴 (187)
凌源近年出土的几件陶瓷器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刘 莉 (193)

二、历史地理与地方史研究

汉晋隋唐之南苏水与南苏城考	王绵厚 (200)
辽代横州及横山的地理考察	
——兼论唐薛仁贵会战辽东之横山	王绵厚 (206)
唐“营州至安东”陆路交通地理考实	王绵厚 (211)
后晋末帝北迁路经地名考	王绵厚 (216)
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	
——兼论东京曷术馆女真部	王绵厚 (219)
关于锦亚台集屯三座古城的历史考察	
——兼论先秦之“屠河”与汉代“徒河”	王绵厚 (224)
隋与唐初粟末靺鞨的南迁及其驻地考	王绵厚 (230)
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	王绵厚 (236)
对金王寂所行“懿州宁昌”地理的再考辨	王绵厚 (244)
后汉辽西郡治“阳乐”故址新探	王绵厚 (249)
“玄菟”与“新城”新解	
——兼论沈阳东上伯官屯古城的建置名称与时代	王绵厚 (254)
唐末契丹进入辽东的历史考察	王绵厚 (258)
鸭绿江右岸高句丽山城综合研究	王绵厚 (265)
关于高句丽古城研究的若干问题	王绵厚 (279)
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	王绵厚 (283)
关于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三城一宫”的地理考证	王绵厚 (301)
新城、南苏、木底道与高句丽南北二道的关系	王绵厚 (310)
关于高句丽第二“丸都城”考略	王绵厚 (317)
天赐年款铜印与辽军政权	姜念思 (321)
一幅珍贵的契丹地图	姜念思 (326)
“塞在宁古塔”辨	王菊耳 (331)
沈阳故宫早期建筑年代研究	王明琦 (335)
《盛京城阙图》的内容与年代	王明琦 (350)
明郑贵妃为子夺嫡新证——兼谈清太宗重修沈阳舍利塔之因	王明琦 (356)
剩人和尚与沈阳南塔诸寺	王明琦 (364)
辽代画家考	阎万章 (371)
论宋代瓷器外销的历史条件	戴鸿文 (379)

三、藏品研究

宋徽宗书法艺术琐谈	杨仁恺 (386)
对高其佩指头画艺术的再认识	杨仁恺 (391)
北宋李成《茂林远岫图》与传世诸作之比较研究	杨仁恺 (400)
唐欧阳询的书法艺术及其传世墨迹考	杨仁恺 (409)

书林三讲——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国际学术会上的报告	杨仁恺 (413)
元鲜于枢补临唐高闲《千字文》考	杨仁恺 (422)
明代画家王守谦的《千雁图》及有关问题	包恩梨 (428)
从《榕坛讲业》册谈黄道周的书法	赵洪山 (433)
《辽东三高士书法真迹》卷研究	徐英章 (435)
中朝二位状元的唱和诗	徐英章 (440)
试论顾恺之《洛神赋》图诸问题	罗春政 (443)
铁保墨迹及诸门人题跋卷考	罗春政 (449)
辽宁省博物馆藏《白莲社图》卷作者考	赵晓华 (457)
对《簪花仕女图》的几点新认识	赵晓华 (460)
赵孟頫《红衣罗汉图》与《秘殿珠林续编》著录之误	赵晓华 (467)
《簪花仕女图》由屏风画改为卷轴画传藏的认识	赵晓华 (472)
达海碑及相关墓碑考述	赵晓华 (476)
王士禛《渔洋诗话》戊子手稿考述	赵晓华 (480)
试论北宋士大夫画的发展	马宝杰 (483)
王翬与《仿古四季山水屏》——兼及王翬仿古诸问题	马宝杰 (493)
明彩绘《九边图》研究	王绵厚 (501)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的比较研究	王绵厚 (508)
论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上的序跋题识	王绵厚 (518)
辽宁省博物馆藏历代官印考录	王绵厚 (528)
辽海地区世存古代印玺概说	王绵厚 (541)
倪瓒《懒游窝图》与几件作品考辨	苏丽萍、人余 (546)
黎民表肖像考	张 锋 (549)
邓石如的隶书特色及其赝作辨识	刘中澄 (552)
漫谈海派画家的艺术精神与审美追求	刘中澄 (557)
古书画作伪与款、题小议	刘中澄 (561)
中国现代绘画的开拓者——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	刘中澄 (565)
试谈“苏州片”的来龙去脉	刘建龙 (571)
卤簿钟的年代研究	王明琦 (575)
兴逐秋风起愁随秋夜长——读赵孟頫行书《秋声赋》卷	杨 桁 (596)
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及相关问题	杨 桁 (599)
鲜于枢及《王安石杂诗卷》	杨 桁 (602)
张旭《古诗四帖》书法艺术赏析	由智超 (605)
天然平淡说宋曹	由智超 (608)
齐白石书法艺术概说	由智超 (611)
白釉铁锈花鸡形“鸡冠壶”辨	李红军 (616)
辽瓷作假与辨伪研究	李红军 (621)
关于高丽镶嵌瓷的几个问题	朴文英 (626)

馆藏的几件外销瓷及其相关问题	戴鸿文 (630)
“天鹿锦”与“天鹿补子”的用途及年代考	戴立强 (635)
明代品官“补子”新探	戴立强 (639)
鲜于枢研究七题	戴立强 (647)
馆藏《李鸿章手札》研究	刘 焯、邢军 (659)
清人《扁舟诗意图卷》考释	刘金库、李燕 (667)
韩希孟的刺绣艺术	杨景秀 (671)
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碑志综述	王海萍 (674)
“熨人”小考	刘 宁 (680)
辽宁省博物馆藏明代铜火铳	刘 宁 (683)
辽宁省博物馆藏雕龙玉圭的年代、用途及名称	周晓晶 (687)
明定辽大将军炮——吴三桂固守宁远抗清的物证	刘 韞 (691)

四、博物馆学研究

试论博物馆的“三性”及其相互关系	姜念思 (694)
博物馆改革中的效益观	王绵厚 (699)
辽宁历史文物专题陈列形式设计随想	李 梗 (703)
试论陈列的展品组合设计	王维忠 (708)
谈馆藏佛教艺术品陈列	李石杰 (711)
博物馆讲解工作中的观众心理学探析	刘阿娟 (717)
说明员讲解潜力的发挥与提高	刘阿娟 (720)
博物馆中小学教育基地调查与思考	田 力 (721)
辽宁北票莲花山辽墓壁画的揭取	李宏伟 (726)
谈卤簿钟高浮雕纹饰墨拓	郭德胜 (730)
古旧书画装裱要旨浅谈	邵庄雯 (734)

说“阳安”布

徐秉琨



易安布

先秦古钱方足布中，有一种面文二字，一为“𡈼”，一为“易”（阳），背文常有“左”“右”等字样（图一）。这种布曾见于很多钱谱的著录，但长期以来，古钱学家们考释不一。

清乾隆时期的“钦定”《钱录》曾著录此币，而引宋人著作《路史》，列为所谓“高阳金”^①。其后张崇懿《钱志新编》释此布为“途阳”，又说“上一字不可识，或云涂（按即途）阳，或云陶阳，终在疑似之间”。马昂《货布文字考》释曰“宓阳”。除此之外，一般学者皆释“郃阳”，即陶阳。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今考其篆法，右曰陶，左曰阳，二字俱省偏旁。《禹贡》：‘东出于陶邱北’。《说文》：‘陶丘在济阴’。《国策》：‘秦封君以陶’。《史记》：‘范蠡止于陶’。”李佐贤《古钱汇》说同。曹铨《古泉汇志》：“证之《史记》，魏冉封穰侯，复益封陶。《索隐》称陶即定陶。按陶邑齐地，因陶山而得名，此布文曰陶阳，殆其地在陶山之阳欤？”由上可知，初、李、曹三氏皆以布的地名为齐地。而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则说：“有署陶阳者，尧初居陶，在平阳，疑沿旧称，仍晋地也”，疑为晋（三晋）地。

近世古钱学家对此布作了新的分析。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始列此布于燕币，他说：“此布文旧释郃阳，为陶阳省文，谓春秋时曹国所都。但曹都之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四里，而此布出土则在燕地，当非曹都之陶所铸。且此布形制亦狭腰，与益昌等布同，背文著有左右等文字，又与襄平布同，其亦递嬗于易刀（引者按：即燕币“明刀”，近释厘——即燕——刀）也甚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也说：“一般认为涿、益昌、壤坪、坪阴、郃阳等布是燕国所铸。这些布的形制的确同其他小方足布有别，比较小样”。

郑、彭二氏的分析和对此布的认识可说较前进展了一大步。但是，由于对面文的考释仍囿于前人“郃阳”的旧说，故仍不免于困惑。郑家相说“唯燕地之名陶者无可考，殆失传欤？”

今按此布文字“𡈼”应释“安”，面文应释“易安”即“阳安”，释“陶阳”非是。布为燕币无疑。阳安之地应在今辽宁朝阳地区建平县水泉一带。说如下。

一、布为燕币无疑

探讨布钱的铸地，除其面文地名有可与文献相印证者外，一般应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即：钱币的形制与钱币的主要出土地区。这是因为，（一）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的

制约，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铸作的钱币在形制上总有着不同的特点（包括文字的风格与特点），而时代相同、铸地相邻近，则其特征也相同。故三晋布币有三晋的共同特征，燕币、齐币也各自有其本身的特征。（二）一个地区铸作钱币，其目的应当首先是在本地区使用，满足当地交换活动的需要。固然当时钱币不限地区皆可通行使用，但古代交通不便，当地铸币必定仍然是相对地集中使用于铸地附近，因而也就更多地出土于铸地及相邻地区。齐刀多出山东，“明”刀多出燕地，即此之故。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知：

（一）在形制上，此布与三晋布有异。三晋方足布一般为平肩，布的“裤腿”两侧为斜行的直线，颈部与首顶的宽度相近。币面文字挺放不羁，字体博大，笔划直线较多，弧曲较少。阳字多有阜旁，右侧易字下部的大弯或作折线，或作曲度不大的长弧。背面一般无文字，尤其无“左”“右”等文字。周币布形制则一般为耸肩、束颈，裤腿两侧不作斜线而作内弧的曲线，即所谓“狭腰”。币面文字较小而整齐，圆笔较多。“易”字无阜旁，下部大弯笔弯转兜回，其形如钩。背面有“左”“右”等文字，或在左侧，或在右侧。这种币身形制与可以认定为燕布的“纆坪”（即襄平）布（出于燕国辽东郡的首府襄平，即今辽阳）同，与公认为是燕布另一些方足布“坪阴”（即平阴）小布，“益昌”布等也同。尤其是背有“左”“右”字样，与襄平布和燕之“明”刀相同，而为一般三晋布所不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左”“右”一类的字样，在燕国文物中除见于币文外，尚见于五十年代河北兴隆出土的铁农具范锄、镰等物，文曰“右委”。对“右”下一字的释文虽诸家不一，尚有可商，但这种文例不同于玺文和兵文的“左司徒”、“右工师”等官职之名是明显的。因此，分左、右，系一些燕器与燕币的共同特点。

（二）关于这种布钱的出土地点，郑家相氏早已指出“在燕地”。据解放以来的考古发现，此布在辽南的辽阳、盖县，辽西的朝阳、锦州地区和辽东、辽北地区都有出土。且此布常与襄平、平阴布共存，并每每占有一定数量，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三种布钱的出土地区主要在历史上燕国的辽西、辽东两郡。相反，中原、尤其三晋地区出土此钱则甚少。

因此，无论从钱币形制还是从出土地点来看，周币布都可确认为燕币无疑。

二、𠄎字应释“安”

如前所述，布面文字𠄎字之释，历来有“途”“宓”“𠄎”数种（“高阳金”之说，近世考古研究已证其荒谬，可不论）。但释“途”之说，盖以𠄎下左方之一大弯当“辵”字，其实古文从无如此写法。涂字从余，金文余作𠄎（孟鼎）、作余（秦公簋）、作余（齐侯壶），《说文》涂字作𠄎，皆与𠄎字迥不相侔。而释之为“宓”，亦颇不伦，盖据《说文》，宓字从八弋，弋在八中，金文宓字作𠄎（秦簋）、作𠄎（休盘）、作𠄎（无彘鼎），与𠄎亦无涉。故“途”“宓”两说仅为个别人所持有，无附从者。唯释“𠄎”之说，采之者甚众，需要加以讨论。

按《说文》：“𠄎，瓦器也，从缶包声。”“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凡缶之属皆从缶”。由此可知，𠄎字从缶，而缶又是一个象形字。在金文中

可见到𠂔字，作𠂔（能匱簋）、作𠂔（能匱尊）、作𠂔（荀伯盥）。古玺文𠂔字作𠂔（“平匱宗正”玺）。不管它们上面的“包”字形首还是下面的𠂔字都与币文的𠂔不同。𠂔的形象是午（杵）在器中，极清晰。午字作𠂔、作𠂔，象杵形，下面的字形为𠂔，为𠂔，或为𠂔，象敞口之器或器中又有物，亦非如𠂔字下面的两点加一长弯。两字的基本结构有殊，𠂔字实非𠂔字。

其实释字为“𠂔”，仅是古泉学家的释法，古文字学家并不作如此解释。古文字学家释此字为“安”。早在清道光时编著的《金石索》曾收此布五品，即释𠂔为安，作安阳。《金石大字典》亦释安。罗福颐《古玺文编》于此字则皆释安。《说文》“安，静也，从女在宀下。”今𠂔字上为𠂔，下为𠂔，正是女在宀下。𠂔为宀字，金文中其例甚多，即钱文“武安”（尖足布）安字字首亦作𠂔，𠂔即宀固无疑义。唯下面的女字写作𠂔形，似属少见，古钱学家所以未定此字为安，或此之故。按𠂔字有异于一般古文字中的女字者在于两端，一为下面加有两笔（或两点），二为上面（腹部）的口字形框一侧不封口。关于第一点，按之金文，女字作偏旁时虽一般不加笔，但加笔者所在亦有。如“威”字作威（王孙钟），其女字即有加笔。而金文、玺文安在女字之旁加一二笔更属常事，作𠂔（𠂔面）、作𠂔（公贾鼎）、作𠂔（格伯簋）、作𠂔（国差鬲）、作𠂔（陈犹簋）、作𠂔（单字玺，见《续齐鲁古印璽》），不加者反而少见。钱文“安阳之法化”刀安字作𠂔，亦加笔。意者，古文“女”“母”一字（容庚说，见《金文编》），如“姜”字有作𠂔（伯猪父鬲）者，其“女”字有双乳。或安下之“女”亦有加乳为母者，其后腹中两点下移，乃讹变为女字下加一二附笔如上引“安”字之形。关于第二点，女字腹部口字形框一侧不封口，金文中亦非无例。吴王光鑑“姬”字作𠂔，叔叔鼎“媿”字作𠂔，其女旁之口框皆一侧开口。两器俱春秋时物，可知早在战国之前，女字已有如此作者。盖文字发展至此，讹变已多，非唯女字为然。总之，𠂔字实为女字之或体。𠂔即安字。



文安都玺

证。

三、面文应释“易安”

字应释“安”既如上述，布面文字为“安”“阳”二字可以认定。但作为战国时期燕国的一个地名，应是“安阳”抑是“阳安”尚须作进一步考察。盖布钱文字虽一般读序为自右而左，但古代金文恒有反文，币文更是如此。诸如平州、文阳、大阴、高都、宅阳、安阳、中都，兹氏等等布文都有此类情况，甚至有文字上下倒置者，其例甚多，固不足异。此布文字虽一般为𠂔字在右，然如《古钱大辞典》图一七二所收，亦有𠂔字

在左者。历史文献对燕国地名记载甚少，应释为“安阳”或“阳安”均待考。欲解决此问题必须参考考古资料。

1978年，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辽宁建平县水泉遗址的发掘中，在遗址上层（战国文化层）发现了一块陶片。这似是一件罐形器物的肩部碎片，存一残耳。陶片上有一长条形印铭，文曰“易安都王氏”。承发掘者李庆发同志同意，现将这一陶文的拓片掲載于后（图三）。按战国陶文文例，前三字“易安都”是地名。鎡字于战国铭文时可见到，罗福颐《古玺文编》释“鎡”；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释“鎡”，说“燕国玺印的印面多呈条形，有细长的柄，自名为鎡”。此六字全文意为易安都“王氏”所作陶器之印。秦汉以后行郡县制，“都”这一城邑称号渐行废弃^②，故“阳安都”是先秦时燕国地名。

值得注意的是陶文“易安”二字与钱文“𠄎”“易”二字写法相同，尤其是安字的写法与钱文、玺文更是一致。同是燕国北方的古城邑，未有可以巧合如此者。故钱文与陶文所反映的应是同一地名：燕国的阳安都。而布面文字也应读阳安而不是安阳。布应称“阳安”布。

关于阳安之地现在何处，因资料所限，尚无法确定。但考虑到陶器多是本地制作，又因易于损坏而难以远运，故阳安应在陶片出土地不远，即不离建平一带，是可以肯定的。李庆发同志言，现水泉之西南约十八里处保存着一处战国城址，方圆约五百余米，地面分布有战国时期陶片等遗物。疑此城或即阳安都之所在。阳安可以铸钱，其必是辽西的一个重要城镇。

建平一带在战国时期约处于燕之右北平与辽西两个邻郡交界处之附近。秦汉时期北方郡、县的区辖大约仍燕之旧，但《汉书·地理志》辽西与右北平两郡均无阳安县，说明汉时此城已经弃置。但《地理志》有“阳乐”县，为辽西郡治所在地。“阳安”与“阳乐”如姊妹称，或是同时建置的两个都邑，或“阳乐”系即“阳安”之名迁地改作，皆已无考。《汉书·地理志》在汝南郡有阳安县，说者谓在今河南确山地，东汉在附近又置阳安郡。然河南与建平相距甚远，所志自非一地。或系汉代因汝南既有阳安，为免重名致淆，而废辽西阳安之称，亦未可知。然亦已无考。

安字如此写法，明确者至今已三例，即阳安布、阳安陶铭与文安都玺。阳安、文安皆燕地，可知在秦统一文字前，燕国安字通如此作，系一地区性特点^③。

阳安布为继襄平布之后，可明确认定为辽宁地区铸造的第二种燕国布币，两布一在辽东，一在辽西，对研究当时辽宁地区的商业经济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易安都”陶铭

① 《路史》后纪八《高阳》有“制十等之币，以通有无”之语，后人遂将不识之古币，属之“高阳金”。

② 战国官玺中常有某某都字样（亦有略去都字者），至汉代封泥所反映的郡县级官印中已无“都”字，而述曰某某（县）或某某（郡），说明此时城邑已不称都。但此后城治区划于县以下有“都乡”，东汉封爵有

“都乡侯”，从“都乡”一名中还可看到“都”的遗痕。

- 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益昌的益（）字同空首布上的益（）不同，从前有人释为恭昌，如果确是益字，那只证明为燕国的特殊写法。”可见燕币文字与他国不同，原不止安字一例。

（原载《中国钱币》1985年1期）

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

徐秉琨

辽宁历年来出土了一些带铭文的战国时期的陶器、陶片，有些与历史地理等问题有关。现将其中有关联的4件予以介绍，并作一些简单的考证。

陶铭和印载该铭的陶器与陶片的情况：



图一

①“……王氏”铭陶片。1955年辽阳三道壕遗址出土。因器片太小，陶器原形不辨。残片方角略似梯形，铭文处无纹饰。铭记为用长条形戳记在器坯未干时打印在陶器外壁。字痕凹下，戳记文字原应是凸起的，即朱文（图一）。

②“西城都王氏”铭陶壶，2件，80年代初期朝阳袁台子战国墓葬出土。墓为土坑小墓，单人葬。壶为灰陶，大口、叠唇、束颈、球腹、圜底，有绳纹，如一般战国陶壶。2件同铭，皆印于肩上，铭长条形，字痕凹下。但二铭微有差别，不是出于同一个戳印。此墓系李庆发同志发掘，据告，当地是一战国墓群，但有如此陶铭的陶器仅见此二件（图二）。



图二

③“阳安都王氏”铭陶片，1件，1978年建平水泉遗址发掘出土。遗址下层属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其上层为战国文化层，此片即出土上层中。似是一件罐形器物的肩部碎片，存一残耳。铭文印于耳旁，亦长条形。字痕凹下，同上二种陶铭。

④“白庚都王氏”铭陶壶，1件，70年代略左兴隆庄二步尺村小湾战国遗址出土。据发现者刘新民同志告知，当地战国遗址方圆约500×300米，文化层深达3米，曾出战国刀币150余公斤。铭亦长条形，字痕凹下（图三）。

二

以上陶铭4种，其①拓片曾发表于李文信先生执笔的《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一文（载《考古学报》1957年1期）之图一，文末释。遗址下层有零星战国文物出土。其③拓片曾发表于拙文《说“阳安”

布》（《中国钱币》1985年1期，图三）。

四种陶铭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

1. 印痕皆长条形，印位明确的皆大致印于陶器肩部，字迹皆凹入器身，说明用于



图三

打印的原物即玺的文字是突起的。

2. 铭文字体皆属战国文字。明确的铭文内容,其后四字皆为“都王氏”四字。三道壕所出①虽仅存“王氏”三字,但例以另外三种陶铭,王字之上也应为都字,似无可疑。

其不同的特点为,“王氏”铭周围有方形形边框,另三铭则不见边框。

四种陶铭中,“阳安都”一铭,前于论阳安布时曾略作分析。今再进一步考述如下:

1. 都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城邑之单位名称。在秦代“废封建,改郡县”即以郡统县之前,一些国家在行政地理区划上已有郡的建制,如赵有雁门、云中郡;魏有上郡、西河、上党等郡;韩有三川、南阳等郡;楚有汉中等郡;秦有陇西等郡;燕在秦开开土后,置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等等。但城邑的建制,一般称“都”。《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条:“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郑庄公弟共叔段的封邑)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这是说作为封邑的都城有大小之分,按制度最大者不能超过国都三分之一。雉是城邑规格的计算单位,据杜氏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过百雉。”又据同书《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此外,《周礼·地官·小司徒》按照井田制的说法,将行政地理区划分为井(“九夫为井”)、邑、丘、甸、县、都六级,“以任地事而令贡赋。”《管子·度地》分为里(“百家为里”)、术、州、都四级。按照《周礼》的说法,一都辖九千余“夫”即数千户,《管子》说法则一都辖十万“家”,规模都不小。实际的都城体制是否如此严整和复杂,不得而知。但两书所指似乎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通都大邑,为中原和齐地情况,辽宁战国陶文虽也见有“里”字字样(凌源安丈子古城出土),却似乎难以想象这样的规模。但总之,“都”是一个城邑单位,陶铭××都,即说明是××都制作之陶器。至秦汉之后,行郡县制,以郡辖县,“都”的建置渐行废止。

2. 关于陶铭中的“阳安都”铭。前曾作过简单的考释,略谓阳安两字与阳安钱文一致,“安”字与玺文一致,阳安都疑即是建平西南约18里处的一处战国城址,在战国时约处于燕之右北平与辽西两个邻郡交界处之附近。《汉书·地理志》已无阳安县,但辽西郡治阳乐县,与阳安如姊妹称,或是燕国同时建置的两个都邑,阳安后废;或是阳乐系即阳安之名迁地(迁至今义县之西)改作,唯皆无考。但阳安可以铸钱,其必是当时辽西的一个重镇。

关于“西城都”陶铭,“西”字与兴隆战国铁范“右西”之西字相同。“城”字写法为“土”在“成”下,按战国“城”字多有如此写法,“平”字作“坪”,也往往写为“土”在“平”下,铭为“西城”固无疑义。陶壶出土在袁台子,考虑到陶器容易制作却也易于破碎,难于也不须远运,其产地,即西城都位置当在袁台子附近。但西城都在文献中不见记载。至西汉,《汉书·地理志》在辽西郡有柳城县,注云:“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柳城县历经两汉,至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出卢龙塞,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

百里”(《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后大破乌桓,斩蹋顿单于,即此处。由于《后汉书·赵苞传》唐李贤注称“柳城县属辽西郡,故城在今营州南”;又《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福德之地也,乃筑龙城,……遂迁都,号曰和龙宫”,而营州,龙城皆指今朝阳,故历史地理学者一直认定汉柳城在今朝阳南。1979年辽宁省文物普查队在今朝阳南20里的袁台子村发现汉城遗址,出土有大量陶器、铁器,并有战国铜铍,尤其发现带有“柳”、“柳城”字样的瓦片、砖片。据云“城为土筑,方形,……南北向,城廓除东城墙迹明显外,其余三面已塌毁,现存城址南北长280米,东西宽450米,据初步估计原城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朱贵、王晔:《在朝阳发现汉代柳城县治遗址》,《辽宁日报》1979年5月21日1版),证实了汉柳城故址即应在今袁台子。此遗址西南对大柏山,或就是《汉书》注所称之“马首山”。有意义的是,“柳城”铭款的“城”字尽管是隶书,也每每作“土”在“成”下。

战国的西城都铭陶壶与汉代的柳城铭砖瓦片同出于袁台子,当地既有汉墓群又有战国墓群,这就有理由使人认为,战国西城都与汉柳城县应是一地。古音“酉”“柳”同在幽部,酉为喻母,柳为来母,均为舌音,两音相距极近,或可以通假。应是战国时原名西城,秦汉改都为县,因酉、柳音近(同部邻纽),遂逐渐叫成柳城。总之,袁台子在战国时已有“西城”都邑,至汉时因同音而定名为“柳城”县。

西城确定之后,不禁又使人回过头来看兴隆铁范铭文的“右酉”。此字唐兰、郭沫若皆释“酉”。郭老说:“准物勒工名之例,‘右’当是右工师,‘酉’当是工师之名”。(《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见《奴隶制时代》)郭老说右是右工师之省当然有道理。但由于西城都的确定,就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右酉”是一个地名即另一个都邑的名称,以其位于西城之右面而得名。犹如燕币“明刀”背文有“易邑”,为地名。背文又有“右易”“左易”等字样,李学勤谓“均为燕国之地方区划”(见《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7期)。恰似今之地名位于锦州之西曰锦西,位于故宫之前曰宫前。“右酉”全称应是右酉城,“右酉”是省文。古玺封泥有例:右北平太守章即省作“右北太守”。铁铭、陶铭同例,兴隆铁范应是“右酉都”的产品,“右酉”在右北平郡。

关于“白庚都”陶铭。“白庚”也不见文献记载。但出土地在喀左,属燕国右北平郡范围。《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下有白狼县,“庚”字古音在阳部,“良”“狼”也在阳部,“庚”与“狼”同为舌音(一为舌根音,一为舌尖音),两音相近,很可能“白庚”即是汉县“白狼”的前身,战国时原名“白庚”,数百年后因语音变化或其他原因成为“白狼”。地名衍变的类似情况是常见的。对东周时期的刻铭研究发现,对同一人名,刻铭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的文字很不一致,而语音却相近。当然,如推而溯于更早的文字,这类字音变化的情况也是有的。

按《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白狼县条下有师古注:“有白狼山,故以名县”。白狼山即今凌源、喀左一带的山脉。又有白狼水,同书地理志辽西郡临榆县注:“榆水首受白狼”,白狼水即今大凌河。《水经注》谓白狼城在大凌河西岸。曹操征乌桓蹋顿,“登白狼山,望柳城,卒与虏遇,纵兵击之,虏众大溃,斩蹋顿,胡汉降者二十万口”(《水经注》引《魏书》)。三国魏人缪袭曾作《鼓吹曲·屠柳城篇》记述和歌颂此事:“屠柳城,功诚难,度越脱塞路漫漫,北逾平冈,但闻北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营海外,永无北顾患。”

关于汉白狼城,考古工作者倾向于在喀左县平房子乡黄道营子汉城址。城址在大凌

河之西岸 700 米,城东西长 210 米,南北长 89 米,1961 年调查时尚有部分城墙存在,残高约 1 米,宽 5 米,夯土筑成,南有城门,城外有护壕。城址出土有战国至汉代的陶片、瓦片,如菱形纹瓦,绳纹筒瓦,灰陶豆等,并有千秋万岁瓦当,日光镜,环首铁刀,五铢钱等。附近的三台村有密集的汉墓群。城址距兴隆庄乡直线距离约 20 余公里。

四种陶铭中唯辽阳三道壕出土的一件铭文残缺。但根据以上对“阳安”、“酉城”和“白庚”三都铭文的分析,考虑到这一陶片出土地点为汉辽东郡襄平县境内,襄平在战国时已是辽东重镇,很有影响,分析全文应是“襄平都王氏𡈼”6 字,现仅残存后 3 字。

自秦开五郡,《史记》仅记五郡之名,除“自造阳至襄平”一句外,未及其他都邑。至《汉书·地理志》五郡之下列县甚多,当非突然涌现,应在战国时期即有其基础。辽宁有关城址和陶铭的发现,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有助于对燕国北方县都情况的了解。

三

四种陶铭体例一致,最后三字皆为“王氏𡈼”。这似是统一颁发的玺印定式,需要研究。按颁发玺印之权在于上级政府,今四个都邑分属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而铭例一致,可知这一体例不是各郡自定的。然则颁发者只能是诸侯国,即燕的中央政权—燕王室。因此,“王氏”的“王”字应指燕王。“王氏”意犹“王室”“王庭”。(在带有“王”“𡈼”字样的几件类似玺文中,“王”下一字现一般释“氏”。亦有空而不释作□者,如罗福颐主编之《古玺汇编》。窃以为此字可以释“乍”即“作”,“王作”即王家作坊之意,书此备考。)古代用王来代表政权、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室意如朝廷,《书·胤征》:“尔众士同力王室”,即共同效力朝廷。但是冠有“王”即中央政权名义的玺印,上面却加有地方机构的名称“××都”,应如何理解呢?这应该是一种由地方管理而用朝廷名义分散设置的机构。即管理制陶业的中央驻在机构。这或者是官营手工业—制陶业的生产机构,或者是管理、检验和批准当地陶业生产的机构。《汉书·地理志》在某郡某县下记载有“盐官”、“铁官”,是官营盐铁生产和专卖的机构,而未记载有陶官。但官府制陶业是存在的,归于司空。汉长安城出土瓦铭有“元延元年都司空瓦”“天凤四年保城都司空造官瓦”,就是实物的例证。“王氏𡈼”铭应与汉代的“司空造瓦”同义。按照“物勒工名”的原则,本来还应有更细的铭记,如:“尹某工师某造”等等,但可能因陶器生产量大,比较起来也不算贵重,因而就以加盖戳记的办法,简化处理。关于生产者的身份,在齐国陶铭中见有“王卒”字样,即是征发的军卒或役卒,这或可作为燕国陶铭的参考。

简括以上介绍,可知“××都王氏𡈼”是燕国北方地区一般的陶铭定式,虽然没有中原发现的一些铭文那样明细,但也反映了王室对北方陶业生产的管理情况。铭作长条形,书“𡈼”作“𡈼”,则都是燕铭特点,和已发现的燕玺情况是一致的。这几个“都”都是燕国北方比较重要的都邑,到了汉代,大都变成县治。

(原载《辽海文物学刊》1992 年 2 期)

先商文化探源

蔺新建

商人起源的问题，历代学者看法不一，综括起来主要有三说：即东来说、西来说和北来说^①。近些年来，随着华北和东北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似乎北来说有异军突起之势。金景芳先生曾就商人北来提出了几点富有建设性的看法^②，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邹衡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结合文献资料，就商文化的起源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果的探索，可谓独辟蹊径^③。邹衡先生从考古学文化入手，在考古学上否定了商文化东来或南来的可能性。但是邹衡先生所持的商人北来说似亦有商榷之余地。其北是否仅限于“唐河以南、河南省淇河以北、卫河以西、山西省的沿太行山西麓一线”的范围，还是颇有疑问的。

本文拟就文献的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对该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传说时代的商人祖先

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前后的中国国土上，分布着许多不同的考古文化。如黄河流域的山东龙山文化、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陕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甘肃的齐家文化。长江流域的浙江良渚文化、湖北龙山文化、东北地区南部的小河沿——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这些分布于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各具特色，反映了当时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那么，哪些是商人祖先创造的文化？他们主要活动在哪些地方呢？

《国语·鲁语》：“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颡项，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颡项，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

《礼记·祭法》作商人“禘嘗”。关于“嘗”的材料甚少，大约他没有什么赫赫战功，因此古史中记载他的材料远不及黄炎那么多。然而，他却也能跻身于“五帝”之列。《五帝德篇》谓：“帝嘗，玄器之孙，蛭极之子，曰高辛”。《史记·五帝本纪》亦云：“帝嘗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蛭极，蛭极父曰玄器……高辛于颡项为族子”。集解：张晏曰“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高阳即帝颡项。看来帝嘗与颡项为同一世系，同属一个部落集团。因此颡项和帝嘗在古籍中常混为一谈。《淮南子·原道训》：“昔共工……与颡项争为帝。”在《天文训》中又谓“昔者共工与高辛氏争为帝。”《国语·楚语》：“颡项……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而《郑语》又作黎为“高辛氏火正”。《华阳国志》曰：“昌意……生子高阳，是为帝嘗。”这些记载反映了颡项与帝嘗的关系极为密切，应是同一部落集团的首领。颡项、帝嘗所代表的这一集团主要发生和活动在北方。

《吕氏春秋》云：“冬月，其帝颡项，其神玄冥，天子居玄堂，立冬之日，迎于北郊”。《庄子·大宗师》：“夫道……颡项得之，以处玄宫。”《墨子·非攻下》：“高阳乃命玄宫”，当时颡项被尊为北方之大神。而商的先祖活动亦多在北方。《诗》曰：“玄王桓